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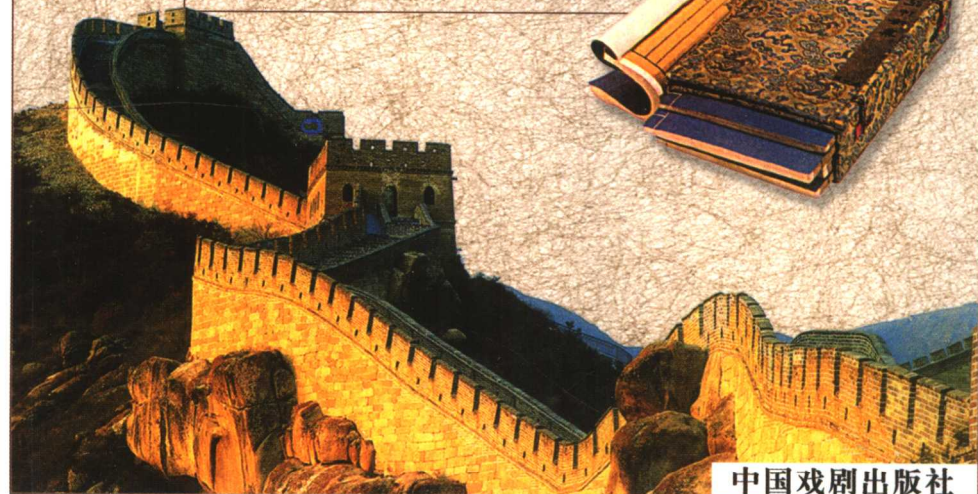


【第十九卷】



中华五千年 风云纪实

蔡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

(十九)

蔡 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二编 大明王朝

宦官张永	(3425)
奸佞江彬	(3427)
大同兵哗变	(3429)
前后七子	(3432)
古文家茅坤	(3436)
文学家李攀龙	(3437)
文坛盟主王世贞	(3438)
杰出的散文家归有光	(3441)
文武双全的唐顺之	(3442)
吴门画派	(3444)
祝允明和唐伯虎	(3446)
书法家沈度	(3448)
杰出的书画家文征明	(3449)
心学的创立	(3450)
泰州学派	(3452)
学者罗钦顺	(3454)
嘉靖崇道教	(3456)
学博才优的夏言	(3459)
严嵩擅权	(3468)
毒祸商民的陈奉	(3472)
阴险狠毒的门达	(3473)

征剿河套	(3477)
蒙古南犯	(3480)
《永乐大典》的编纂	(3483)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3487)
太监冯保	(3489)
抗倭名将俞大猷	(3492)
宁夏之乱	(3500)
杨应龙之反	(3503)
清正明士海瑞	(3508)
宠臣陆炳	(3514)
矿税之害	(3516)
“惑世诬民”的李贽	(3519)
戏剧家汤显祖	(3523)
公安派	(3525)
袁宏道和袁中道	(3529)
“三言”和“二拍”	(3530)
章回体小说创作	(3533)
太监李芳	(3535)
东厂太监陈矩	(3537)
东林党争	(3538)
争立国本	(3543)
西学东渐	(3546)
《徐霞客游记》	(3550)
书画家董其昌	(3551)
沈周	(3553)
狂士徐渭	(3555)
明宫三案	(3556)
刚直的宦官王安	(3560)
徐鸿儒起义	(3562)

萨尔浒之战	(3564)
熊廷弼之死	(3570)
宁远之战	(3574)
袁崇焕	(3578)
魏忠贤专权	(3591)
魏忠贤的党羽们	(3598)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3600)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3602)
治黄专家潘季驯	(3603)
忠烈之臣左光斗	(3606)
名医倪维德	(3610)
陕北起义	(3611)
太监乱国	(3614)

宦官张永

张永，河北保定新城人。正德初年，总领神机营，与刘瑾同伙，但后来憎恶刘瑾的作为了。刘瑾也察觉他不依附自己，就向武宗进言，准备将他贬到南京。张永得知消息后，直接赶到武宗面前，陈诉刘瑾陷害自己。武宗叫刘瑾来跟他对质，正争辩时，张永就奋身举拳，去打刘瑾。明武宗令谷大用等人设宴为二人和解，从此二人更加不合。

及至朱宸濠反叛，明武宗命张永及右都御史杨一清前去讨伐。明武宗身穿军装，到东华门送行，赐给关防、金瓜、钢斧，让他带着上路，对他甚为宠信优待。刘瑾也感嫉妒，但明武宗这时看重张永，无法离间。军队出发后，朱宸濠已被捉获，张永便率领五百人骑马去安抚平定朱宸濠的余党。回军驻扎在灵州时，他告诉杨一清，打算奏报刘瑾的不法行为。杨一清说：“他在皇上身边，您的话准能传到内宫去吗？不如用计杀他。”便替张永出谋划策，张永大喜。

这时，刘瑾的哥哥都督同知刘景祥死了，京城纷纷说刘瑾准备等百官在八月十五日送葬时，乘机作乱。适值张永报捷的奏疏传来，将在这一天进献俘虏，刘瑾让其事延期进行，打算事成后连张永一齐捉获。有人告诉了张永，张永提前进京进献俘虏，便在当天夜里奏准处死刘瑾。

于是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人奏称张永使朝廷内外获得安宁，建立了两项奇功，于是封张永的哥哥张富为泰安伯，弟弟张容为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曾经在脚上刺了龙形和“人王”二字，张永认为是妖邪之人，将他捉获。兵部尚书何鉴请求为张永加受封爵，武宗交给朝臣计议。张永想使自己封侯，援引刘永诚和郑和的旧例暗示朝臣，内阁以不属定制为理由加以抵制。张

永知道无望，这才表示不必降恩封侯。吏部尚书杨一清建议张永表示推让，以成就他的美名，但最终未能实行。久后，张永因库官盗窃库银的事情获罪，命他闲住。正德九年，北部边疆告急，朝廷命张永督率宣府、大同、延绥的军队前去抵御，敌人退去后，张永才撤军回朝。

宁王朱宸濠反叛，武宗南征，张永率领两千边疆军队先行。当时，王守仁已经捉获朱宸濠，押在囚车里北上。张永遵照武宗的意思阻拦王守仁，打算在鄱阳湖一带放掉朱宸濠，等武宗到达后与他作战。王守仁认为不妥，到杭州去见张永，张永拒不相见。王守仁将守门人呵斥一番，径直走进去，大声喊道：“我是王守仁，来与您商议国家的事情，怎么不让我进来！”张永在气势上为之震慑。于是王守仁说江西已经受尽残害，官军一到，很难说不发生骚乱。张永恍然大悟，便说：“都是一群小人在皇上身边出的主意。我来这里，是要保护皇上，不想抢功。”便指着江边的囚车说：“这应该归我。”王守仁说：“我要这东西有什么用！”便交给张永，与张永一起返回江西。当时，太监张忠等人已经从长江来到南昌，正在追究逆党，见张永来了，大为沮丧。张永停留了几十天，催促张忠一同返回，江西赖以安宁。张忠等人多次说王守仁的坏话，也亏了张永营救开脱，才得以不死。

武宗去世，张永监督九门，以防事变。世宗即位，御史萧淮奏陈谷大用、丘聚一流蛊惑先帝，勾结恶人，狼狈为奸，并且牵连到张永，世宗下诏命张永闲住。不久，萧淮又弹劾张永在江西干了违法的事情，世宗又贬张永为奉御，前往孝陵主持香光。然而，张永在江西实际没有干违法的事情。嘉靖八年，大学士杨一清等人说，张永功劳很大，不可埋没，世宗这才起用张永掌管御用监，提督团营。没过多久，张永死去。

奸佞江彬

由于京军无力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六年（1511年）调边兵进入内地。大同镇江彬随军奉调，参与了两淮、山东等地的战事。江彬因骁勇善战，得到武宗赏识。正德七年（1512年）十月，边军归还各镇。当大同镇边兵途经北京之时，武宗将江彬、许泰等边将留在了京师。不久，江彬由于跟锦衣卫指挥钱宁的关系，得以侍从武宗左右。江彬善于献媚取宠。他知道武宗喜欢军旅、战争等事，便在武宗面前大讲如何练兵、用兵，还引诱武宗以操练士卒为游戏。于是，江彬很快取得了武宗的欢心，被赐姓“朱”，提升为左都督。

但在此时，武宗面前最得宠的还不是江彬，仍然是钱宁。正德八年（1513年）十月，武宗认钱宁为义子，赐姓“朱”。又将他提升为左都督，掌管锦衣卫，负责处理皇帝交办的案件。钱宁权势极大，气焰嚣张。他勾结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和、一些喇嘛，引导武宗纵情声色。他还在宫中盖起豹房，日夜陪着武宗在那里寻欢作乐。武宗常常因此而耽误上朝。群臣要面见武宗，都要先通过钱宁的门路。于是，一些文臣武将，纷纷重金贿赂钱宁，以求肥缺美差。都察院钱岌无耻到拜钱宁为父的地步。钱岌还利用职权之便弹劾那些冒犯过的官员，以讨好钱宁。这时，唯有掌管东厂的宦官张锐权势与钱宁不相上下，他们任意捕捉政敌，随时抓缉百姓，京师之民听到此二人的名字，人人自危，似乎他们是“厂卫”之代称。

从正德九年（1514年）二月开始，钱宁、张锐、张雄等人挑唆武宗四处微服私行，寻欢作乐。百官一再进谏，武宗根本不听。次年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永良弹劾钱宁用宝钞两万，强迫浙江官府兑换白银三万余两。武宗置之不理。这时，江彬的地位

逐渐上升，也开始和钱宁等人一起陪武宗在豹房玩乐。各衙门的奏章大多被江彬等人扣压。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大学士杨一清上疏弹劾钱宁、江彬等人惑乱朝政。明武宗不仅不听，反而让他辞职。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在江彬的多次鼓动下，明武宗决心去宣府游乐。在宣府游玩期间，江彬等人常常到民间掠取良家妇女供武宗淫乐，使武宗连京城都不想回了。九月，武宗转到大同、阳和等处游玩，然后才回京。十月，回到京师后，立即封江彬为平虏伯，许泰为安边伯。在此期间，典膳李恭上疏指责江彬等人的罪过，请求武宗返京，竟被江彬逮捕下狱，拷打致死。

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宁夏镇报警。武宗决定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任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从北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上疏极力劝阻，武宗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七月，武宗出居庸关，十月到达榆林。这时，宁夏镇警报早已解除，武宗乘机四处游玩。江彬趁机向边将勒索大量金银、玉璧、毛皮、骏马，还强迫边吏进献虎、豹、犬、马。一直闹到次年二月，武宗才回京。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武宗又想南巡。而此时，宁王朱宸濠已在加紧策划叛乱。出巡诏命一下，群臣纷纷上疏劝阻。武宗大怒，在江彬挑唆下，竟下令将黄巩、陆震等六人关进锦衣卫监狱，命舒芬、张衍庆等一百零七人在午门外罚跪五天。后来，又将林大辂、周叙、余廷瓚等二十余人下狱。第二天，又命黄巩等六人罚跪五天。金吾卫指挥张英以死相谏，也被打入监牢。接着，分别处舒芬等人廷杖三十至五十不等，然后分别降官两三级调至京外。结果，员外郎陆震、主事刘毅等十余人竟死于杖下。但是，武宗的南行终未能实行。直到六月宁王朱宸濠举兵造反之后，武宗才以南征的名义于九月到达南京。

江彬等率数万边军扈驾南征。这些骄兵悍将个个飞扬跋扈，不断激起公愤。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在豹房病逝。由于武宗没有儿子，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决定，迎立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同时，张太后、杨廷和秘不发丧，并假传圣旨诱捕了江彬。然后，以太后的名义公布江彬的罪行，厚赏江彬部属，并将其部众遣散回镇。仅仅处死了江彬及少数几名死党。在查抄江彬家产时，仅抄出的黄金就有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其余珠宝首饰不可胜数。此外，还查出江彬私自扣压的奏章一百余本。世宗即位后，又将江彬的几十名党羽处死或充军。同时，还处死了因勾结朱宸濠被关押在狱中的钱宁，驱逐了几十名为非作歹的太监。

大同兵哗变

大同是明代的边关重镇。嘉靖年间，这里就不断遭到蒙古族军队的侵扰。为了巩固边防，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决定在城北九十里处建立“五堡”，作为抵御外族入侵的前沿堡垒。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五堡”即将建成，并计划迁徙戍卒二千五百家开赴那里镇守，平均每堡驻扎500家。消息传开，戍边军士议论纷纷。他们觉得，居住在距城二十里处尚且不断遭到异族侵扰而无宁日，现在要到距城近百里的“五堡”居住，一旦有敌人入侵，谁来相救？于是表示宁死不愿迁徙。张文锦知道后，严令不得抗命。他派参将贾鉴对拒不迁徙者严刑处罚。此举终于导致边卒的兵变。

哗变军士的头目主要有郭鉴、杨忠等人。他们杀死了贾鉴，聚集在焦山附近。张文锦怕叛兵与外敌建立联系，造成更大的危害，便招抚他们入城，然后再捉拿首犯。郭鉴、杨忠等人发现有作为后，鼓动叛卒焚烧了大同府门和都察院门，劫出狱中囚犯，

张文锦也遭到叛兵的追杀，最后才逃到宗室的住宅中。叛兵胁迫博野王交出了张文锦并处死了张文锦，还裂其尸首以泄愤。前总兵朱振被叛卒挟持出头作主，朱振提出三点要求：一勿犯宗室、二勿掠仓库、三勿纵火杀人，如果叛兵答应，便出头主事调解，否则宁死不从。叛兵答应愿意从命。

八月，朝廷决定由按察使蔡天佑继任巡抚，都督桂勇为总兵官，另派太监武忠镇守，同时派遣兵部侍郎李昆前往宣布赦免旨令。蔡天佑来到大同后，会同武忠、桂勇等召集叛乱军卒宣谕朝廷旨意，才使局面稍有缓解，但是仍不时有士卒抢劫事件发生。总兵官桂勇处死了五十余人，其余均被赦免。然而城中依然人心惶惶，到处传言“必尽杀大同人”、“京营暨诸镇兵已驻近地，剿大同矣”等消息。当时刚好碰上户部因公务派进士李枝来大同，李枝遂被认为是来传“密旨”来的。当晚众人又聚集出来，到李枝住处讯问究竟，李枝出来向众人解释清楚之后，人群仍未散去，他们杀死了据说是曾经提出诛杀叛卒建议的知县王文昌，纵火烧毁民宅百余家。第二天，又围逼代王府，代王怕有不测，率家人逃跑。巡抚蔡天佑一边竭力安抚民众，一边向朝廷请示解决办法。

十一月，户部侍郎胡瓚、都督鲁纲率军征讨大同叛卒，称“诛首恶，胁从不问”。大同城中军民十分恐惧，求蔡天佑出面替他们求情以保全他们。蔡天佑再次重申，“兵来惟诛首恶，胁从不问也。汝辈勿助恶即为良民，无事矣”。得此允诺人心稍定。总兵官桂勇设计抓住首犯郭鉴、杨忠等十一人，全部斩首示众。郭鉴的父亲郭疤子纠集胡雄、徐毡儿等人再次聚众作乱，围住桂勇的家宅，抓住桂勇，杀死桂家数人。蔡天佑与武忠赶来反复讲明道理，桂勇方幸免一死。蔡天佑处死了徐毡儿等四名首犯，郭疤子逃走，胡瓚想发兵追杀，被蔡天佑阻止，称“首恶即诛，余党釜鱼耳，易处也。”胡瓚遂班师回朝后，被一些人上疏弹劾为“讨叛无功，逆党未尽得。”第二年二月，郭疤子纠集同伙数十人

潜入城中，乘夜晚焚烧民宅。待天亮之后，蔡天佑擒住郭疤子等四十余人，全部处死。此次兵变终于被平息下去。

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部商议在大同设总制重臣，意在加强这里的守备力量。兵部侍郎刘源清被任命为总制，都督郤永为总兵。十月，大同总兵李瑾建议在城外挖一道四十里长的濠沟，用来防备外族的骚扰。刘源清赞同此议，限定三日完工。李瑾平素就十分严厉，此时为赶工期便对士卒不断严刑催促，士卒不堪忍受，终于又激起了兵变。哗变士卒杀死了李瑾，围住了巡抚潘倣的府第。潘倣跳墙逃脱后，向上言书：“镇将用法苛刻，兵悉变，请置勿问。”而刘源清则主张：“即兵悉变，法不可废，请讨之。”他又在大同城中张榜告示：“五堡之变，朝廷处（罚）太宽。乃今稔恶戕主帅，天讨所必加者。”僉事孙允中希望刘源清不要武力，更不要旧事重提去翻，免得扩大事端。刘源清以为前次胡瓚“以兵不临城，致言者纷纷，吾不可更袭前辙。”刘源清的做法，引起五堡遗属的猜忌。于是他又派人搜捕乱党，而在被捕者的名单中大都为有功之士。各镇士卒抗拒捕快随意抓人，双方冲突日益。刘源清率军来到城下，大肆杀掠，郤永也带领军队来到城下。五堡遗属见状尽数哗变，他们关闭城门，据城自卫，与官军对峙。潘倣、孙允中看到无法控制局面，遂上书皇帝军官妄杀无辜激起兵变的实情。刘源清也上疏称巡抚潘倣姑息逆党，致使镇卒与王师对抗。潘倣逆被罢官。

十一月，兵部尚书王宪称“大同之变，非大发兵诛之不可”。辅臣张孚敬也同意此说。于是任命江桓为总兵，参政樊继祖为大同巡抚。樊继祖恐怕叛卒与外寇联合，决定自己单骑入城晓谕军民，平息此事。但这个建议未被通过。刘源清则一再上疏，“宗室，诸文武都已从贼，实天欲弃此城矣”。朝廷下旨命他攻城。刘源清一面攻城，一面命人决水灌城。哗变军兵据城顽强抵抗，官军攻城没有获得结果，双方相持不下。其间，叛卒与外族取得了联系，鞑靼骑兵在其首领小王子的率领下于嘉靖十三年（1534

年)正月大举进犯。平定大同叛兵的官军不得不分兵抵御小王子的入侵,郤永率军迎击鞑靼兵,结果作战失利,鞑靼骑兵在边关一带大肆劫掠数月后退去。

二月,刘源清请求设总制御外敌,自己专门攻城。朝臣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指责刘源清贪功引水灌城,而到现在攻城未果,又引来外族侵扰,以致震动京师。主张罢去刘源清,另择他人处理此事。刘源清于无奈中,传话城中只处置首犯,其余概不论处。城中一些人闻讯决定充当内应,擒拿首犯,迎接官军。刘源清表面应承与之相应,但他出尔反尔,不守诺言,结果此计失算。朝廷罢免刘源清,任命户部侍郎张瓚代刘源清为总制。张瓚来到军中下令不得攻城,派主事楚书来到城下。城中叛兵表白说,“吾辈非杀将者,畏死自全耳!”楚书进入城中,声言“用兵非朝廷意”,众人皆呼万岁。楚书与哗变军兵达成协议,斩倡乱者,迎官军入城。当夜杀黄镇等24名首犯。巡抚樊继祖也进入城中,安抚人心。郤永仍想从中阻挠,散布流言“继祖伏兵为内应”。当夜又引起不安,樊继祖沉睡不起以示无事。张瓚命令官军后退二舍之外,自己来到城下,张榜晓谕,开仓赈济。城中军兵依次拜谢,以示臣服。兵变至此得到平息。

朝中得知兵变已经平息,降旨核查兵变的原因及过程。论定功过,不久,刘源清、郤永被捕入狱,被削籍降职。潘倣、孙允中恢复其原职。张瓚、樊继祖等有功者均有封赏。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是明代中期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先后掀起了一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诗文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统治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廷

相、王九思等。它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主要活动范围在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是由李梦阳首先提出来的。李梦阳，字献吉，号定同，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被下狱。刘瑾被诛，又被提升江西提学副使。其气节名震一时。“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与李梦阳诗文相交，起初两人十分友善，后因见解歧异而互相诋诃。有《何大复集》三十八卷。为人处事“老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土风”。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者老弗道”。李梦阳的代表性言论有：诗歌以盛唐为归，“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诗至杜甫达于高峰，“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如规，至方不能加矩”。而唐以后的宋诗“主理作理语”，更是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感于外物还须达到心物相“契”，即所谓“心会相契，神契则音”，“随寓而发”。要使诗歌达到“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还必须通过“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的比兴、形象化的表现方法。关于文，则认为文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李梦阳最推重《战国策》的实录精神和优美文采，“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勘为后世之榜样。李梦阳还推重贾谊之文，认为“谊文最高古。”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一致。但其见解也有不同之处，二人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以文坛盟主自居，要求何氏舍己从人，制止其“入室操戈”，以巩固自己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李梦阳先有《赠景明书》，论述景明诗弊，劝其改进。不料何景明竟写《与李空同论诗书》与之相抗衡。其后双方又反复诘难，至景明不能答辩才罢休。（何先李十年而卒）。

李梦阳、何景明在复古这一根本主张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复古上。李梦阳偏重于摹拟古人行迹，“刻意古范”，即学古太似。而何景明则提倡复中有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应该“自成一家之言”，“自创一堂室，自开一户牖”，即学古不似。另一分歧是李重诗文格调、形式的摹拟，“铸形宿模（模），而独守尺寸。”而何则强调内在神情之摹，注重内容的重要性。主张声色为末，质实是本，不能离本就末。与此相关的，李强调字字句句以古为法，尺尺寸寸以古为则，而何则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如此等等，比较而言，何在复古中有创新的进步意义，比李梦阳有较少的保守性。

李何所倡导的第一次诗文复古运动，对冲垮台阁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种唯古是尚的主张和句窃字摹的恶劣文风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其复古运动也就渐渐地平熄了。正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运动步其前履紧随其人，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前七子的主张而登上了文坛。

后七子活动年代约晚于前七子四十年。后七子主将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嘉靖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顺德知府，后擢为河南按察使。著有《沧溟集》三十卷。另一主将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以父忬被杀解官，复起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贞为李攀龙共主盟文坛，时称王、李。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前后七子中，王世贞学问最为渊博，影响最大，他才高，位显，“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心流，莫不奔走进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而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则是七子中的另外几位文人，即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

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与前七子大致相同，他们都是“是古非今”论者。倡导诗之格调、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李攀

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他的诗尽以摹拟为能事。为文则“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王世贞持论与李攀龙完全相同。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还书勿读。”认为诗文都是愈古愈好。他自己的诗文连篇累牍，无不模拟。后七子中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榛，字茂秦，山东临清人，终身布衣。著有《四溟诗话》，后七子中他年龄最长，是七子结社初期的盟主。后来李攀龙声望渐盛，他因与李攀龙论诗不合而终致割席绝交。实际上，后七子论诗的纲领性意见是谢榛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反对盲目地拟古，而主张汲取盛唐十四家的创作经验来作自己的诗。有些近于何景明的观点，提倡模拟中应有变化。前后七子其他成员论点也是大同小异。

前后七子掀起的诗文复古运动，雄踞文坛长达一个世纪左右。他们不单纯是前后各七个人，其实围绕他们在当时形成了两个相当可观的文人集团。他们的影响很大，其复古思潮曾激起巨大的波澜，当时“学者翕然从之”，“推尊之者遍天下”。文体为之一变。应该说他们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对廓清“台阁体”的影响，纠正“萎弱”的文风方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他们的复古模拟和形式主义的主张，却给诗文创作带来普遍衰退的严重后果，这是前七子所始料不及的。到了后七子王世贞的晚年才对自己倡导复古所产生的弊病有所察觉。当时，复古派的反对者已应运而生，一如一度“推尊之者遍天下”一样，“攻之者亦遍天下。”直到“公安派”三袁高举起反复古大旗，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才彻底瓦解。

古文家茅坤

茅坤，字顺甫，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母死，服丧期满，升礼部主事，改任吏部稽勋司，因亏欠犯罪，被贬为广平（今河北永年）通判。又逐渐升为广西备佥事，管辖府江道。

茅坤平素喜好谈兵。瑶贼占据了鬼子各处山寨，杀了阳朔县令。朝廷商讨大规模出征之事，总督应槩向茅坤征求意见。茅坤说：“大规模出征，没有十万兵马是不行的，粮饷要足够。现在仓促之间，不能筹集，而贼人早已占据险地，作了准备。不如用鹏剿之计，突然疾速杀人，消灭他们的首领，其他各部必定会惊恐万状，只好图谋保全自己，这就好办了。”应槩认为他的计策好，把进剿之事全交给茅坤去办。结果，连破十七寨，官升二级，那里的百姓立了祠堂来纪念他。

后茅坤升为大名（今属河北）兵备副使。总督杨博惊叹他是一个奇才，特别向朝廷推荐，由于被妒忌他的人所攻击，追究他先前贪污的事，结果解职而归。而当时倭寇来犯，形势紧急，胡宗宪把他请到军营中，和他商讨打仗之事，并奏请皇上任命他作福建副使。吏部坚持己见，才作罢。他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被巡抚庞尚鹏所弹劾，于是剥夺了他的官籍。茅坤被贬为庶民后，把心用在经商上，家业大发。他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病故，享年九十。

茅坤擅长古文，最佩服唐顺之。顺之喜好唐、宋各大家的文章，他所编纂的文集，唐宋人除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没有什么选取的，所以茅坤选编了《八大家文钞》。此书风行海内，连乡里小孩子，也没有不知道茅鹿门的。鹿门，是茅坤的别号。